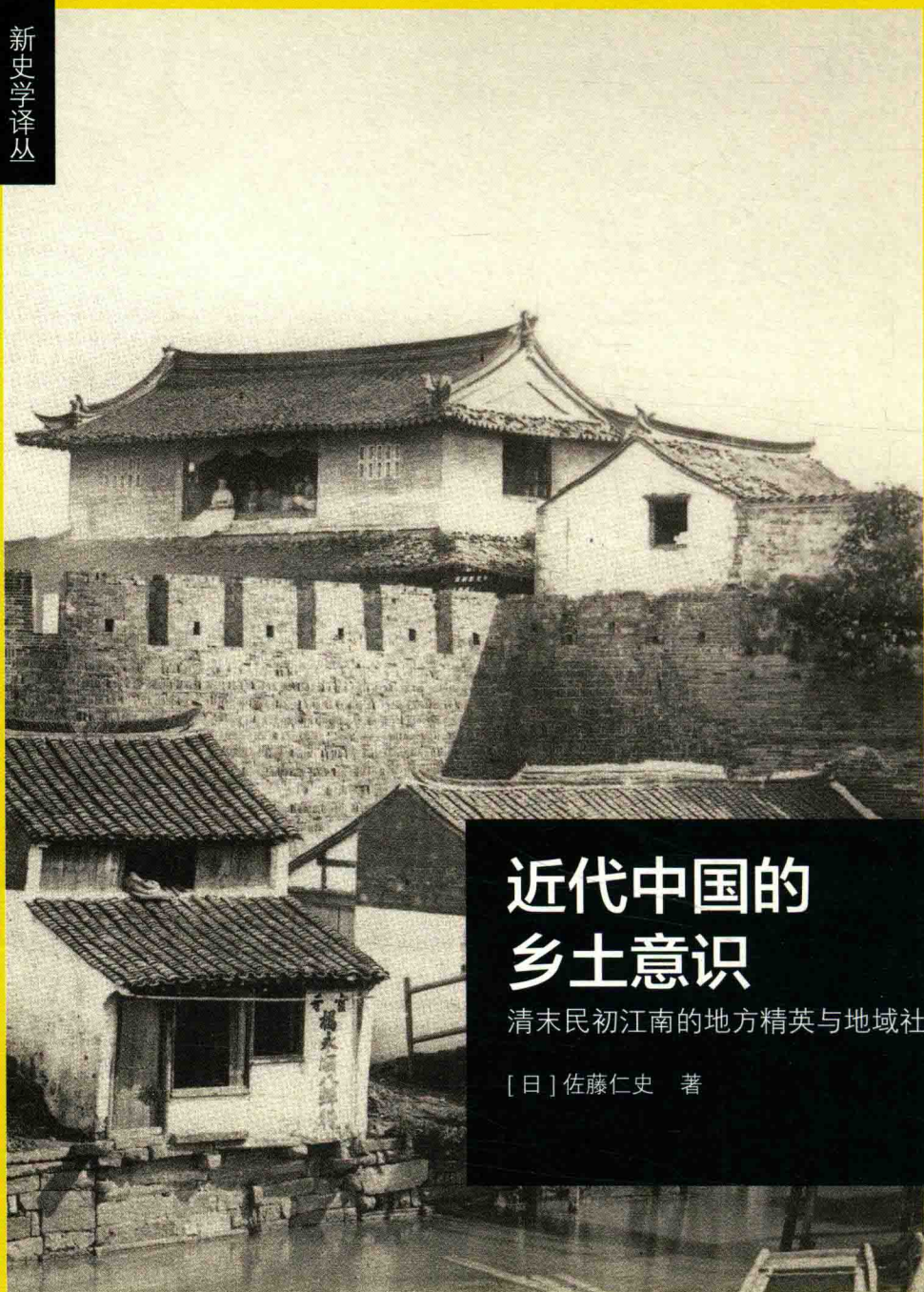




近代中国的 乡土意识

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日] 佐藤仁史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史学译丛



近代中国的 乡土意识

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日] 佐藤仁史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 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日)佐藤仁史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
(新史学译丛)
ISBN 978-7-303-21299-6

I. ①近… II. ①佐… III. ①群众意识—研究—中国—清后
期 IV. ①C91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9533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JINDAI ZHONGGUO DE XIANGTU YISH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宋旭景 陈 鹏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新史学

观 古 今 中 西 之 变

序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晚清民初的思想、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了。但是我们很少从在地的眼光出发，讨论地方上的变化，甚至由“下”而“上”去厘清国家的变化。即使有，也都是从动乱时代的材料与状态着手，对于非动乱时代的状态了解不多。而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一书，便是由“下”而“上”出发所做的研究中的一部好书。

承佐藤先生好意，要我写一篇序，我因为行政忙碌，无法一一综述本书每一章的要义，只能选择三个要点略抒我的感想。

2014年的诺贝尔奖化学奖，颁给了几位利用超高解析荧光显微术来窥探细胞内部分子活动的化学家，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从地方出发来看历史的道理，因为在这个层次内可以看到地方上非常细致复杂的活动。当然，历史不可能只写各个地方，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较大的发展脉络下来看它的发展。但是经过这一层的努力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时视野、境界就显得不一样了。

为何要从“下”出发?“出发”是什么意思?用“出发”一词是强调“注意力”所投注方向的不同,注意力所及的地方才有历史;一如调整显微镜般,在聚焦之后,才能看到许多原先看不到的东西。如胡塞尔所言,注意力所集中的地方,光会有光晕及余光的、残余的之分;或如博格森的研究指出,人的注意力有一个浓淡的光谱,最核心的地区往往最为浓密。没有注意力,即使某事发生了,往往也不会被看到;即使看到了,也较少去面对它,或动手处理它。

从“上”出发或从“下”出发,观看事物的角度和视点是不同的。从“上”往“下”看的视野,和从“下”凝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虽然看的是同一件事,但立基点不同,所看到的也往往不同。在变动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将焦点放在“地方”,看其信息如何传递,新的知识又在地方社群产生怎样的反应?什么样的信息传递是通畅的?何者被人们接受?何者不被接受?对于这些,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基本的了解。

在佐藤的书中,我们看到从晚清新政以来,地方社会突然由一层变为两层。就像是第一章提到地方自治课题中,城镇乡内可以细分为城自治区与乡自治区。而且,在由上而下加上一层之后,还要将两层变回为一层,期望一切皆在中央“制度化”且能掌握的范围中。因应新的局势而出现了好几种现象。第一,不同层级的地方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第二,新旧之间的关系;第三,“下”与“上”、“上”与“下”之间更衍生出许多新的关系,它们往往互相循环取利,到底是“假意”或“真情”,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许多处还与在地的复杂实况相关。伴随行政区域的设定之后,带来税收、政党利益乃至官民人际网络的纠葛,我觉得佐藤在书中对这些极为复杂的层面做了很细致而

有见解的处理，而这些层面是由“上”而“下”俯瞰时所不易察觉的。

这些复杂的状况不免使我们感到，一次又一次的新政策、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究竟在地方上造成什么影响？好比一位篮球选手带球上篮，一般都只注意他上篮的动作以及是否得分，却忽略了他一路拍打篮球之际，每一次拍击，球的内部所承受的力量、撞击地板的角度，乃至球的反弹都相当不同。拍打得太过用力，说不定球要泄气甚至破了；拍打得不够，球可能弹跳不起来。一方面篮球撞击地板，一方面则是地板将之反弹而起，这些变化，就像是地方社会产生的变化。如果我们一直只从全国性的角度，或仅从制度方面着眼，等于只是注意带球上篮及得分与否，不免忽略了球员拍打时篮球内部的变化。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在观察历史变化时，如何既观赏带球上篮的动作，又能注意到每一次拍动篮球时内在的冲击？

佐藤书中有几章在讨论盛泽、嘉定、陈行等地方社会内部的变化。盛泽的新知识分子在推动平民教育同时，也带来镇乡之间的分裂，使得“文明化”并不能涉及农村范围。而嘉定的政争，虽然只是一项夫束赋役改革，却凸显了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关系，并非能轻易革废。至于陈行的地方领导阶层，经由收集竹枝词来贴近百姓生活，并以乡土志诉诸“合群”与“改良”的观念。总括来说，无论是通过乡土志教科书内容，还是竹枝词民谣所展现的地方意识，地方势力与秩序都在不间断地重组，而来自中央的态度、政策及主流舆论的方向，往往是最大的划分力量。时代政治局势及思潮之起伏，其实与地方上不同势力之间的起伏也有分不开的作用。譬如书中提及夫束改革，即与晚清立宪派、革命派之势力起伏相关。这些看似地方派系的对抗，背后常

有政治意识的主导，进一步演变到民国初年成为政党对立的关系。

受限于我个人的专业，我最感兴趣的是近代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下渗的部分，还有新思想运动中它们向下渗透、扩散到什么程度。

佐藤认为市镇社会是这个新思想运动的末梢。我们可以看出在思想观念下渗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筛选。那么，何以在广大的词汇、概念中，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到达下层社会？这些思想、概念又在地方社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地民众对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它们为何与地方精英、现实派系的划分或权力的布局息息相关呢？

我所感兴趣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地方社会是不是因为新报刊的流播，而出现一种“合伙人效应”。在佐藤的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新式精英惯于透过媒体，形成舆论，进而造成影响，如《嚆报》这类在地媒体，对地方社会起过很大的作用。^① 近代地方“舆论社会”的形成是一种新的现象，胡适曾在一篇英文文章这样提醒我们：“突然间，在地方出现大量的刊物，它们形成地方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小小的地方社会中，向来都是仰赖大都市提供知识的，它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舆论社会。”^② 而这个舆论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社会“政治化”了，它们反复发挥动员力量，成为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也造成地方势力的重新划分。

① 此外，佐藤另有《20世紀初頭の中國における地方政治と言論——江蘇省嘉定県の地方紙“嚆報”に即した初步的分析》一文，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9.12。

② 胡适著，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5册，第254页。

谈到“舆论社会”，我想借用智利小说家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 1889—1946）的《合伙人》（El Socio）中的情节稍作说明。《合伙人》借沸腾股市中的一个小人物的心理，烘托智利人崇洋媚外的心理。小说主角胡亮做生意很不顺利，常找人调头寸，却常常被人问到合伙人是谁？他索性就捏造了一个英国合伙人——戴维思，从此大发利市。人们于是不再相信胡亮，只相信他所捏造的合伙人，甚至最后弄得胡亮不得不安排一场假的决斗，将他的合伙人杀掉，并登报声明。但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胡亮在商场腾空而起，倚靠的是戴维思；后来他一败涂地，也是因为合伙人戴维思。^①

我认为近代中国“舆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一种“合伙人效应”，即订阅或批读新式报刊的人，在仿佛之间往往想象自己在某些地方有一群合伙人。每天送来的报刊也像一位定期来访的合伙人。这些合伙人的数量很大，彼此并不认识，却隐隐然关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个设想与 Benedict Anderson 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由“印刷资本主义”产生“想象的共同体”不无关系。我认为是一群散布在各地、互不相识的读者，共同接受某一思想观念，隐隐然认为互相之间是“合伙人”，再由这个合伙人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合伙人群体是想象的、虚拟的，唯一的关系只是共同阅读；可是在巨大的时代氛围中，他们成为地方上象征权力的拥有者，而且支持或反对这些概念，成了划分派系、分割权力的工具。一旦大气候变了，

^① 赫纳罗·普列托（Jenaro Prieto Letelier）著，曾茂川译，《合伙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

“合伙人效应”当然也会面临变化。

佐藤的书充分吸收中、日史学界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成果，他深入“地方性史料”，大量运用地方刊物、报纸、杂志，而且尽力掌握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新旧政见与各种势力，这些势力既是思想意趣的，又是现实利益的，它们层层套叠又循环取利，构成了一幅色块斑斓的印象派油画。

王汎森

2015 年秋天

目 录

序章 / 001

第一编 地方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

第一章 清末的城镇乡自治与自治区设立问题——以江苏苏属
地方自治筹办处的管辖地区为中心 / 028

导言 / 028

第一节 从《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看城区与乡区 / 032

第二节 围绕于设立城区的城乡对立问题 / 036

第三节 乡区设立问题与地方意识 / 061

小结 / 070

第二章 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中的对立局势——以江苏省嘉定县
的地方领导、自治、政党为个案分析 / 072

导言 / 072

第一节 夫束的结构及其得利者 / 078

第二节 清末地方精英的“地方战略”与城乡对立 / 087

第三节 民初县议事会运作与民政长选举的纠纷 / 103

第四节 政党组织与地方精英 / 114

小结 / 127

第三章 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以上 海县乡绅秦锡田的活动为中心 / 130

导言 / 130

第一节 上海县农村地区的精英阶层与地方自治 / 134

第二节 清末地方自治的诸问题与秦锡田的改革案 / 141

第三节 民初的地方行政财政与秦锡田的活动 / 152

小结 / 175

第二编 如何叙述乡土

第四章 地方志和乡土志中的近代中国乡土意识——以江南地 区为中心 / 186

导言 / 186

第一节 《川沙县志》中关于地方的叙述法 / 190

第二节 乡镇志中展现的乡土城市化、文明化及风俗 / 198

第三节 乡土志所见的文明化和乡土 / 206

小结 / 218

第五章 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陈行乡土 志》及其背景 / 220

导言 220

第一节 上海农村的地方精英阶层 226

第二节 地方精英阶层的乡土教育活动 233

第三节 《陈行乡土志》所见的地方精英与地方财政	242
第四节 《陈行乡土志》的教育观与秩序意识——“改良”与 “合群”	251
小结	257
第六章 文学作品中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民俗观——以 “歌谣”为线索 / 262	
导言	262
第一节 上海县陈行乡的地方精英阶层和“歌谣”	265
第二节 地方精英阶层的“知识世界”	272
第三节 启蒙和民俗	278
小结	293

第三编 新文化与市镇社会

第七章 清末民国时期近代教育的引进与市镇社会——以江苏 省吴江县为例 / 296	
导言	296
第一节 清末民初近代学校设立中的市镇与农村	300
第二节 20 世纪 20 年代的平民教育与市镇社会——以盛泽镇为 中心	311
第三节 从私塾看清末民国时期的农村教育	328
小结	337
第八章 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20 世纪 20 年代吴江市镇 社会与地方知识分子 / 340	

导言	340
第一节 20 世纪 20 年代吴江的地方报与新南社	344
第二节 民治与绅治——地方自治与市民公社	349
第三节 “新文化”与市镇社会的转型	357
第四节 平民教育中的民俗观	369
小结	377
 终 章/	380
附录 乡土志目录稿（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390
参考文献/	393
后 记/	414

序 章

本书着眼于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的市镇社会，讨论这一空间以及从中生成的乡土意识，还有地域社会的变化过程。首先想说明的是，为何以清末民初和江南市镇社会作为时空分析对象，从中又打算厘清什么问题呢？在序章中，打算以四个部分说明：第一、第二部分分别在江南地域史的研究脉络和清末民初史的学术源流中，提示问题之所在和本书的论点。第三部分解说本书所使用的地方文献。第四部分则阐明本书的结构。

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问题所在和分析方法

（一）江南地域史研究的成果和课题

考察江南的地域发展脉络时，被称为市镇（或乡镇）的农村商业聚落一直受到重视。伴随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经济政策的历史性大转变，市镇被称为农村工业化的中心，开始备受瞩目。这一农村政策的理论性依据，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国独特发展

模式，即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防止农村过剩人口向大都市涌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①这一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内发发展”的可能性之一，亦即不将发达国家形式视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准绳，而是摸索相应于国情、地域条件的发展形式。^②但是今天大都市的经济发展、人口移动等现象变得非常显著，当时被提倡“以乡镇企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近代化模式，进入了接受历史使命评价的阶段。

将市镇乃至市镇间网络视为中国农村的内在发展孵化器来重新评价，定位江南市镇发展的研究，也成为史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主题。特别是在农村政策中提倡“苏南模式”，显示国家将江南市镇作为发展类型之一。^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费孝通即提出关于农村经济建设的先驱性构想；因此在前述的发展模式转换中，对费孝通一系列学术研究

① 关于费孝通的江南农村认识和他提倡的“乡土工业”，参见小岛晋治等译：《中国农村の细密画：ある农村の记录 1936～82》，第201～203页，东京，研文出版，1985；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收入费孝通学术指导，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宇野重昭、鹤见和子将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乡土工业”、农村副业以内在发展视角为题，与日本研究者和中国方面共同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宇野重昭、朱通华编：《农村地域の近代化と内发的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东京，国际书院，1991年；宇野重昭、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と外向型发展：现代中国における交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③ 苏南模式的目标是，以传统中国时期形成的市镇与农村为基础，实现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推动乡村工业化。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降，引进外资的“外发型”因素引人注目。宇野、鹤见前掲书，第1～11、第251～276页。关于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论和模式论，佐佐木卫：《费孝通：民族自省の社会学》（第84～102页，东京，东信堂，2003）有一个简明的解说。

成绩进行再评价可说是自然之事。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进展，是以明清市镇的长期发展过程和经济机能的研究，其中多数研究者使用地方志，发掘史实。^①近年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进一步产生了多种主题成果。^②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学界。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森正夫、滨岛敦

① 利用乡镇志，取得的实证成果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后大幅增写为《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而且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学者关于江南市镇的先驱性实证研究成果（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也在中国大陆出版，显示了当时对江南市镇历史的高度关心。关于江南市镇研究，参见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与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所收《市镇研究文献目录稿》；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47期，1999；及陈忠平、唐力行编：《江南区域史论着目录（1900—2000）》，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② 最近的研究，有从空间视角的讨论，即市镇与周边农村关系的有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关注个别市镇，分析市镇与外部世界的网络有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也扩展到江南地域史，在不同领域都有专书刊行，研究基础确实扩大了。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王卫平：《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